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
目标、战略与路径
(结项报告)**

国家信息中心

2020年9月

目 录

摘要.....	1
第 1 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研究.....	2
1.1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
1.2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
1.3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
第 2 章 中长期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构建.....	6
2.1 利用生产函数测算潜在增长率.....	6
2.2 利用 CGE 模型模拟经济社会结构.....	7
2.3 经济社会发展情景设定.....	9
第 3 章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11
3.1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要素变化趋势判断.....	12
3.1.1 资本存量变化趋势.....	12
3.1.2 劳动力变化趋势.....	12
3.2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变化趋势判断.....	13
3.2.1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影响因素.....	13
3.2.2 分时段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14
3.3 基准方案下中长期中国经济总量预测.....	15
3.4 多方案下中长期中国经济总量预测.....	17
3.5 多方案下中长期中国人均 GDP 预测.....	19
第 4 章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预测.....	20
4.1 多方案下中长期中国产业结构预测.....	20

4.2 中长期中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	21
4.2.1 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成为普遍的农业发展模式.....	21
4.2.2 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制造业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22
4.2.3 消费型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22
4.3 中长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23
4.3.1 农业发展走向全球的战略态势.....	24
4.3.2 制造业跻身全球中高端价值链.....	25
4.3.3 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26
第 5 章 中国人口及社会发展趋势预测.....	28
5.1 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趋势预测.....	28
5.1.1 各主要研究机构对中国人口总量及结构的预测.....	28
5.1.2 中长期中国人口总量预测.....	29
5.1.3 中长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30
5.2 城镇化发展趋势预测.....	31
5.2.1 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31
5.2.2 中长期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预测.....	33
第 6 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35
6.1 基本路径.....	35
6.2 战略框架.....	39
6.3 主要政策.....	41

摘要

本报告基于国家信息中心中长期计量经济预测模型和大型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SICGE 模型，构建了我国经济-能源中长期预测模型体系，重点对 2025 年、2035 年和 2050 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25-2050 年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发展实现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根本转变；产业结构呈现不断优化升级的基本趋势，第一产业比重呈现小幅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波动下行，工业化顺利完成，第三产业呈现爆发式发展，服务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未来 35 年将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时期，人口总量和结构呈现新特点，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经济发展彰显实力。2025-2050 年经济增速趋缓，“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预计增速为 5.5% 左右，2021-2035 年中国经济年均预计增速为 5% 左右，2036-2050 年年均增速为 3.5% 左右。预计 2025 年前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名义 GDP 总量将达到 27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35 年名义 GDP 总量达到 56 万亿美元，2050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达到 115 万亿美元左右，人均 GDP 将达到 8.5 万美元左右，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 GDP 的 55% 左右。

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到 2025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二产业比重将降至 34.1% 左右，第三产业占比有望达到 59% 左右。2035 年彻底完成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比重降至 28% 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至 66.5% 左右。2050 年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降至 24% 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至 70% 左右，此后将基本稳定，与大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持平。

社会发展更趋协调。从人口总量来看，到 2025 年全国人口约为 14.26 亿人，2028 年前后出现人口总量峰值（14.3 亿人左右），2050 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 13.5 亿人左右。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2025 年 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3.17 亿人，占比达到 22.1%；2035 年我国老龄人口将增长到 3.71 亿人，开始过渡到中度老龄化阶段；2050 年老龄人口将增至 4.48 亿人占比达到 33.2%。从城镇化水平来看，2025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64.6% 左右，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2035 年城镇化率达到 68.5% 左右，进入城镇化推进的后期阶段；2050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72% 左右，总体完成城镇化的任务。

第 1 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研究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

“两个一百年”自此成为一个固定关键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九大报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和长远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的 30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每个阶段 15 年。

1.1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人均收入超过 1 万美元（2010 年价格，下同），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城镇化率达到 60% 左右，基本完成工业化。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城乡差别和收入差别扩大的趋势明显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积极实施新型对外开放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亚太自贸区等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取得实效，形成更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格局。金融对外

开放取得实效，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1.2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党原来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将提前 15 年实现。这是考虑到，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目前的良好基础和发展势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把握的。

经济与科技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发展实现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升，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基本形成，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城市品质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在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之后，到 2035 年跃升至创新型国家前列。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达到高度有机统一。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制度更加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得到有效落实，人权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大为增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基本建成。依法治国得到全面落实，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局面基本形成。

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凝聚力不断提高。重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社会风尚基本养成，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

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中华文化走出去达到新水平。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保障、可持续。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愿景，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口预期寿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公平正义充分彰显。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健全。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能源、水等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状况明显改观，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立，生产空间安全高效、生活空间舒适宜居、生态空间山青水碧的国土开发格局形成，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改善。中国碳排放总量将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态势，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3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望那时的中国，通过坚持不懈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将全面提升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一是中国将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核心竞争力名列世界前茅，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超越其他国家，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中国将拥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中国将拥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自觉行动，国民素质显著提高，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建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四是中国将拥有高度的社会文明，城乡居民将普遍拥有较高的收入、富裕的生活、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公平正义普遍彰显，社会充满活力而又规范有序，建成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是中国将拥有高度的生态文明，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普遍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那时，中国作为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将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将作出更大贡献，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 2 章 中长期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构建

在国家信息中心已有的中国中长期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和基于 GEMPACK 软件的大规模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基础上，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满足潜在增长能力、国际环境约束等条件为前提，开展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情景预测。

2.1 利用生产函数测算潜在增长率

本研究采用生产函数测算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形式如下：

$$Y_t = AK_t^\alpha L_t^\beta$$

其中 Y_t 为现实产出， L_t 为劳动投入， K_t 为资本存量， A 为全要素生产率， α 、 β 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根据宏观经济生产函数，GDP 增长分解为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三部分。基于对劳动力、资本和 TFP 在未来的趋势分析，可以预测 2025、2035、2050 年三个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进而测算经济潜在增长率。

在经历 40 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随着外部环境和内生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换挡期，原有增长动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需求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明显减弱，满足外部需求的投资扩张速度放慢，制造业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长放缓，基础设施扩大投资受到负债水平制约，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从供给看，制造业在经历过去几年迅速扩张后，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制造业部门资源和生产要素向服务业部门转移，但多数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部门，造成经济效率下滑。从要素投入看，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投资率趋于下降，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放缓，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经济进入换挡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动力主要集中在提高生产效率上。

总体而言，本研究中，GDP 增速不是根据历史趋势外推，而是在对资本存

量、劳动力数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生产要素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生产函数对 2025、2035、2050 年三个时段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

2.2 利用 CGE 模型模拟经济社会结构

SICG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General Equilibrium) 模型是一个基于 MONASH 动态 CGE 模型的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Dixon、Parmenter and Sutton, 1982)。该模型是由国家信息中心和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 CoPS 中心联合开发的。模型数据基础为中国 2012 年投入产出表以及 2013-2017 年相关的中国经济数据 (Mark and Glyn, 2008)。

SICGE 模型是在融合了 MONASH 模型主要结构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经济有关特征和数据建立。它是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以及投入产出理论，其基本的方程体系以及基本方程包括了生产模块、需求模块、流通消耗模块、进出口贸易模块、价格模块等模块。同时，为了实现模型的动态化，SICGE 模型还加入了一系列动态化的元素，如跨期动态链接、数据的动态更新和劳动力模块等 (Dixon 和 Maureen, 2002)。另外，SICGE 模型还可以通过测算历史时期的参数外推进行部门和产业预测。最近模型在长期预测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Dixon 和 Maureen, 2009)。

SICGE 模型基本特点：一是模型规模较大、注重细节。SICGE 模型包含 162 个产业部门、175 种产品，3 种投入要素 (劳动力、资本、土地) 和 6 个经济主体 (生产、投资、家庭、政府、国外、库存)。模型同时考虑了 11 类流通投入 (Margin)，分别为：海上货运、空中货运、空中客运、铁路货运、铁路客运、公路货运、公路客运、管道运输、保险、贸易 (批发和零售)、仓库贮存 (Dixon 和 Maureen, 2002)。这些设置综合起来，使得 SECGE-SIC 模型的规模较大，其中核心模块的方程数量超过一百五十万个。不过也正是这些细节设置，使 SICGE 模型能够尽量细致入微的刻画经济现实，同时较为准确地测算政策的影响。

二是充分刻画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SICGE 模型包含丰富的生产技术进步参数、消费偏好参数以及描述市场扭曲的偏移参数。在描述生产技术进步和消费偏好改变上，能够多角度地捕捉各个层次上的变化。例如对于节能技术进步，模型既有参数描述因为产业升级实现的整体节能，也有参数描述因为技术替代产生的能源结构调整。此外，模型还可对中国经济存在的市场扭曲进行描述，例如当

前存在的成品油价格管制、电价管制等等行为。这些参数值的标定过程都可以通过独有的“历史模拟”完成，并引入 2013-2017 年的历史数据进行标定和校准。

三是详细刻画了能源与经济的联系。SICGE 建立了经济与能源供需的转换机制，输出所需能源服务需求变量。建立了能源总量预测与分项预测的接口机制，具备确保总量与分项保持一致的能力。引入了能源核算机制，理顺经济活动中的能源供需关系，具备在预测年份编制能源平衡表的功能。建立优化机制，刻画生产、消费活动中对能源的最优需求量。引入了各种能源产品的有限替代机制，具备了描述短期替代的功能。

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关注经济系统内的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人口就业、居民收入、财政收支等领域的各自变化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领域之间的彼此关联关系如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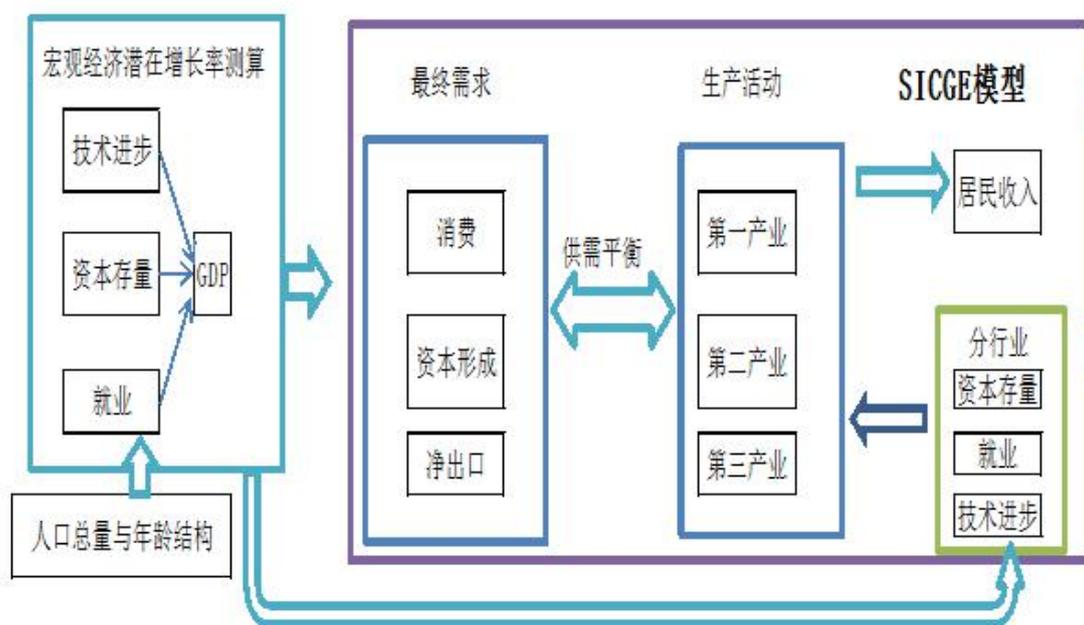


图 2-1：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预测模型技术路线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上述测算研究总体思路框图进行具体解释：

(1) 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的潜在增长动力源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各要素的投入符合最优化原则：为满足市场需求，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优化资本要素投入和就业要素投入。其中，未来的资本存量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存量和投资的增长；就业总量则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参与率等。利用生产函数概念，根据人口走势、资本存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走势可以测算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2) 将宏观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结果输入国家信息中心可计算一般均衡(SICGE)模型,按照各种产品、要素市场供需平衡的原则,对未来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就业增长、收入水平开展平衡测算。这是个迭代计算的过程:首先给出最终需求的初值,然后测算满足最终需求的产业结构;生产过程产生的工资、资本回报、就业需求、资本需求会改变最终需求的初值和相应产品、要素的价格;调整后的最终需求会计算出新的产业结构,并开始迭代;最后通过价格调整实现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需平衡。其中,生产决策中,中间产品和要素投入决定于满足需求下的成本最小化原则;投资决策中,投资需求总额取决于当前资本存量和对未来期望回报率的判断,而在投资品组合的决策中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消费决策中,在消费预算总额约束下,以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选择各类消费品;产品出口主要取决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和偏好程度;同时,产品进口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进口品与国内产品相比的可替代程度以及价格优势。

2.3 经济社会发展情景设定

在各种情景的模拟中,首先外生设定了人口、城镇化进程等;其次,设定了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考虑了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动作用;此外,各种情景下均假定社会保持基本稳定,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环境动荡、战乱等事件发生。设置基准方案、高方案、低方案三种。

(1) 基准方案。综合考虑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增长态势。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储蓄率下降导致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小幅减弱,而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稳步提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收入差距缩小,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2) 高方案。在基准方案的基础上,资本依然发挥重要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趋于最大化和效益趋于最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正义合理,包括扩大人力资本投入、实质性推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优化改进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健康安全开放体系等因素,逐步成为支撑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驱动力,但环境质量改善一

般。

(3) 低方案。在基准方案的基础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为负，而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取得一定程度的提高，全面深化改革进展一般，环境质量较之前有所改善。

第3章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从现在到 205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2016-2020 年，中国工业化将由中后期向后期过渡，城镇化快速推进，经济将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均 GDP 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2035 年，中国工业化基本趋于稳定，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中国经济将处于中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 2035 年基本完成工业化；2036-2050 年，中国将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逐步趋于稳定，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到 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居家隔离、取消各类公共活动、延长春节假期等疫情防控力度和波及范围均超过“非典”。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人民生命健康造成危害的同时，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严峻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当前境外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为应对疫情的不利冲击，我国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六稳”工作，强化“六保”举措，随着政策的持续发力，我国经济将稳步回升，预计 2020 年经济增长 2.0%—2.5%。

从经济学意义来看，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内生变量）和外部因素（外生变量）两大部分，而新型肺炎属于影响经济运行的突发外部冲击因素，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较大，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从 2020 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经济虽受疫情冲击影响出现负增长，但我国具有完备的经济体系，坚实的经济基础，巨大的国内市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空间较大，部分民生保障领域和新动能领域仍保持增长甚至较快增长，而且整体经济正呈现出恢复势头，亦显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

没有发生改变。同时，此次疫情防控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且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国内外冲击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可以预期我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阶段”战略目标。

3.1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要素变化趋势判断

3.1.1 资本存量变化趋势

国际比较显示，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投资率峰值呈现上升趋势。英国最先工业化时期实际投资率峰值约为 12%-20%，美国工业革命时期升到 28%。战后追赶国实际投资率峰值进一步提升：日本在 1973 年达到峰值 31.6% 左右，韩国在 1996 年达到峰值 40.6%。越是晚近时代，全球化拓展深化使得信息、技术转移越发便利，后进国家在追赶期的投资率峰值呈现不断提升的规律。中国的高投资现象是这个规律的表现。当然不是说投资率越高越好。相反，二战后最初几十年很多发展中国家选用计划体制和政府主导模式实施赶超战略，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依靠政府强制动员社会储蓄实现高投资，但最终遭遇微观经济绩效低下与宏观失衡而无法持续，不得不通过改革开放另谋出路。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具有高储蓄特征，而高储蓄率必然导致高投资率。从各国历史经验上看，如果一个经济体储蓄率能占到 GDP 的 30% 或者更多，那么它必然会保持较快经济增速。2015-2050 年期间，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不会改变，但储蓄率呈逐步降低趋势。当前中国储蓄率在 50% 左右，2015-2050 年期间储蓄率有下降趋势。

综合判断，2015-2050 年期间中国投资增速将逐步回落，但由于投资增速快、惯性大，2015-2050 年期间前期投资平均增速较高，中后期将呈递减趋势，预计 2016-2020 年、2021-2025 年、2021-2035 年、2036-2050 年三个时段资本存量年均增速分别在 8.4%、6.4%、6.0% 和 3.1% 左右。

3.1.2 劳动力变化趋势

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构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和结构变化的基础，而通过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中国的人口潜力，这又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时间里，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从 1978 年初的 5.5 亿人增加到 2012 年的 9.9 亿人，平均每年增

长 1.74%，较同期总人口增速高 0.72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正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才能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近年来，受总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深化影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已经在不断趋缓，2012 年后 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综合判断，2015-2050 年期间中国劳动力数量将呈下降态势，预计 2016-2020 年、2021-2025 年、2021-2035 年、2036-2050 年三个时段劳动力数量年均增速分别在-0.004%、-0.010%、-0.008%和-0.012%左右。

3.2 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趋势判断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如果 TFP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小，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反之，如果 TFP 的贡献大，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由于边际要素报酬递减，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经济才会持续发展。

3.2.1 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TFP 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相关文献，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科技进步或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影响 TFP 增长的一个最核心因素。科技进步或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技进步使得同样的投入比以前产出更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积累必将受到各种限制，比如人口增长的限制、资源的限制等，持续的经济增长必将更多地依赖技术的进步。

第二，对外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不仅扩大了市场范围，也引进了资金和技术，对于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技术先进的外商企业对于国内企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存在很强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的技术改进。同时，市场的开放度带来的竞争的加剧，迫使国内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这些都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稳固的制度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的增长，而农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家庭生产的控制的放松导致旧体制被打破所释放的增长潜力，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挥。后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样对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1997）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0.5 个百分点。

第四，要素的重新配置。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三十多年中的 TFP 的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主要体现在要素有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提高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如，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五，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是指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形成的，因此所有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与能力、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支出，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力资本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人口的整体素质以及劳动力素质都得到了快速的提高。

3.2.2 分时段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2016-202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十三五”期间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关键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以进一步激发技术进步的潜力。《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力争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必须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依靠科技进步拉动经济增长。从目前的情况看，“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研发资本存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2021-2035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从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都是相对有限的，故 2021-2035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处于的技术进步或创新周期阶段。根据上述技术进步或创新周期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缩短，进而可能使第五个经济长

波经历的时间缩短，尤其是衰退期缩短。因此，根据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以计算机和 IT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五轮技术进步或创新长周期经过 1991-2008 年的繁荣阶段，2008-2020 年的衰退阶段后，预测 2021-2025 年、2021-2035 年技术进步或创新的趋势将有下降转为上升，即处于衰退转为复苏的阶段。

2036-205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同理，从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都是相对有限的，故 2036-2050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处于的技术进步或创新周期阶段。根据上述技术进步或创新周期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缩短，进而可能使第五个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缩短，尤其是衰退期缩短。因此，根据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以计算机和 IT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五轮技术进步或创新长周期经过 1991-2008 年的繁荣阶段，2008-2020 年的衰退阶段，2021-2035 年的调整和复苏阶段后，预测 2035 年后将迎来的是新一轮新的重大意义的技术进步或创新发生，进而推动技术进步或创新走出困境而进入新一轮上升和繁荣周期。预测 2036-2050 年技术进步或创新的趋势将保持上升趋势，即处于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阶段。

综合判断，受经济增速换挡影响，2015-2050 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亦将呈下降趋势，预计 2016-2020 年、2021-2025 年、2021-2035 年、2036-2050 年三个时段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在 3.07%、2.64%、2.72%和 2.49%左右。

3.3 基准方案下中长期中国经济总量预测

2016-2020 年时段：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看，投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投资增速与 GDP 增速的比例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快于 GDP 增速变为慢于 GDP 增速。但预计“十三五”期间（特别是“十三五”前期），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较大，所以投资率仍较高，投资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但人才红利增强。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高。但从科技创新周期（熊彼特周期）来看，全球科技创新处于相对低谷，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占据主导地位。

2021-2035 年时段：中国工业化趋于稳定，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经济处于中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 2030 年基本完成工业化。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看，中国工业化基本趋于稳定，城镇化

继续较快推进，因此投资增速慢于“十三五”期间，但仍保持较高增速，劳动力数量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随着对 R&D 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增长以及通过改革增强市场活力，TFP 增速加快。这一时期，世界进入新一轮创新周期，相应中国的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在这一时期，资本和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

2036-2050 年时段：中国将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放慢并趋于稳定，中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到 2050 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放慢之后，经济主要靠服务业和消费拉动，投资增速降低。但由于中国人均 GDP 水平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所以投资率和投资增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劳动力数量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世界进入新一轮创新周期的高潮时期，新技术对经济各部门的渗透率提高，将推动中国及全球增长加速。在这一时期，TFP 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综合考虑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预计 2016-2020 年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6.6%左右，投资（资本）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1-2025 年间 GDP 年均增速为 5.5%，资本积累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对 R&D 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增长以及通过改革增强市场活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逐步提高，而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依然为负，但对经济增长负的贡献率较“十三五”期间有所收窄，主要受“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2021-2035 年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5.0%，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4.5%；2036-2050 年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3.5%，经济增长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拉动（见表 5-1、表 5-2）。

预计 2025 年前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名义 GDP 总量将达到 27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35 年名义 GDP 总量达到 56 万亿美元，2050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达到 115 万亿美元左右，人均 GDP 将达到 8.5 万美元左右，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 GDP 的 55%左右。

表 3-1：基准方案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GDP（亿元）2015 年价	时期	GDP 增速(%)
2015	689052	—	—
2020	947523	2016-2020	6.6

2025	1238376	2021-2025	5.5
2035	1969610	2021-2035	5.0
2050	3315508	2036-2050	3.5

表 3-2：基准方案下分阶段生产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

经济增长阶段	GDP 年均增速	资本存量		劳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	
		贡献度	贡献率	贡献度	贡献率	贡献度	贡献率
2016-2020	6.6	3.53	53.45	0.00	-0.04	3.07	46.58
2021-2025	5.5	2.86	52.08	-0.01	-0.15	2.64	48.06
2021-2035	5.0	2.28	45.60	0.00	-0.10	2.72	54.50
2036-2050	3.5	1.02	29.23	-0.01	-0.23	2.49	71.00

3.4 多方案下中长期中国经济总量预测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达到高峰，比较优势减弱，后发优势在更多低收入国家参与竞争背景下相对减弱，最终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处于下移趋势。但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正在并将继续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国具有基本条件和能力保持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中高速水平。

在高方案下，预测中国 2016-2020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6.7%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3.86、0.0 和 2.84 个百分点。2021-2025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6%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3.09、-0.01 和 2.92 个百分点。2021-2035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5.5%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2.62、0.0 和 2.88 个百分点。2036-2050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4.0%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1.65、-0.01 和 2.36 个百分点（见表 5-3、表 5-4）。

在低方案下，预测中国 2016-2020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6.5%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3.78、0.0 和 2.72 个百分点。2021-2025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5%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2.76、-0.01 和 2.25 个百分点。2021-2035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4.5% 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2.36、0.0 和 2.15 个百分点。

2036-2050 年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3.0%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拉动 GDP 增长 1.39、-0.01 和 1.62 个百分点（见表 5-5、表 5-6）。

基于上述两种情景分析，根据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保障程度，同时充分考虑到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仍然有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态势，最后对照中国确定第二个奋斗目标经济社会发展预期，建议以基准方案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宜，即 2016-2020、2021-2025、2021-2035、2036-2050 三个时段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目标定为年均增长 6.6%、5.5%、5.0%和 3.5%左右，这一目标导向下的发展环境相对从容，宏观调控比较主动。

表 3-3：高方案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GDP（亿元）2015 年价	时期	GDP 增速(%)
2015	689052	—	—
2020	952959	2016-2020	6.7
2025	1275275	2021-2025	6.0
2035	2127219	2021-2035	5.5
2050	3849172	2036-2050	4.0

表 3-4：高方案下分阶段生产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

经济增长阶段	GDP 年均增速	资本存量		劳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	
		贡献度	贡献率	贡献度	贡献率	贡献度	贡献率
2016-2020	6.7	3.86	57.67	0.00	-0.03	2.84	42.36
2021-2025	6.0	3.09	51.45	-0.01	-0.13	2.92	48.69
2021-2035	5.5	2.62	47.67	0.00	-0.09	2.88	52.42
2036-2050	4.0	1.65	41.25	-0.01	-0.20	2.36	58.95

表 3-5：低方案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GDP（亿元）2015 年价	时期	GDP 增速(%)
2015	689052	—	—
2020	944061	2016-2020	6.5
2025	1204888	2021-2025	5.0
2035	1826816	2021-2035	4.5
2050	2859747	2036-2050	3.0

表 3-6：低方案下分阶段生产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

经济增长阶段	GDP 年均增速	资本存量		劳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	
		贡献度	贡献率	贡献度	贡献率	贡献度	贡献率
2016-2020	6.5	3.78	58.15	0.00	-0.04	2.72	41.88
2021-2025	5.0	2.76	55.13	-0.01	-0.16	2.25	45.03
2021-2035	4.5	2.36	52.36	0.00	-0.11	2.15	47.75

2036-2050	3.0	1.39	46.20	-0.01	-0.27	1.62	54.07
-----------	-----	------	-------	-------	-------	------	-------

3.5 多方案下中长期中国人均 GDP 预测

在基准方案下，扣除人口总量自然增长因素后的 2016-2020 年时间段人均 GDP 实际增速为 6.0%，低于 GDP 实际增速约 0.6 个百分点；2021-2025 年时间段人均 GDP 实际增速为 5.4%，低于 GDP 实际增速约 0.1 个百分点；2021-2035 年时间段人均 GDP 实际增速为 4.9%，低于 GDP 实际增速约 0.1 个百分点，与 GDP 增速之间的差距较“十三五”期间大幅缩小；2036-2050 年时间段人均 GDP 实际增速为 3.8%，高于 GDP 实际增速约 0.3 个百分点（见表 5-7）。

表 3-7：基准方案下未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人均 GDP（元/人）2015 年价	时期	人均 GDP 增速(%)
2015	50127	—	—
2020	66932	2016-2020	6.0
2025	87063	2021-2025	5.4
2035	136408	2021-2035	4.9
2050	237670	2036-2050	3.8

表 3-8：高方案下未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人均 GDP（元/人）2015 年价	时期	人均 GDP 增速(%)
2015	50127	—	—
2020	67316	2016-2020	6.1
2025	89237	2021-2025	5.8
2035	147324	2021-2035	5.4
2050	275925	2036-2050	4.3

表 3-9：低方案下未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人均 GDP（元/人）2015 年价	时期	人均 GDP 增速(%)
2015	50127	—	—
2020	66688	2016-2020	5.9
2025	86335	2021-2025	5.3
2035	126519	2021-2035	4.4
2050	204999	2036-2050	3.3

第 4 章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开创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上则是国家引导、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技术人才等不同产业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正处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规范、调整、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并积极推进以“知识型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4.1 多方案下中长期中国产业结构预测

综合考虑 2020、2035、2050 年三个时段分产业的 GDP 实际增速和价格指数，得出基准方案下现价条件下的产业结构，预测结构显示：2016-2020 年时段，工业化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成效，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5 年的 8.8：40.9：50.2 调整为 2020 年的 7.5：37.5：55.0 左右。2021-2025 年时段，我国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第二产业比重将降至 34% 左右；第三产业比重继续呈稳步上升趋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进一步凸显，2025 年第三产业比重将上升至 59% 左右。2026-2035 年时段，第三产业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在 2030 年左右突破 60%，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0 年的 7.5：37.5：55.0 调整为 2035 年的 5.4：28.1：66.5 左右。2036-2050 年时段，中国进入世界最发达的服务业强国行列，将成为全球高端服务业集聚中心、主导和引导全球价值链，经济控制力显著增强，第三产业比重在 2050 年左右突破 70%，三次产业结构由 2035 年的 5.4：28.1：66.5 调整为 2050 年的 3.5：24.1：72.3 左右。表明中国服务业正在走向一个全新时代，在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无论是生活型服务业还是生产型服务业，它们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原有增长模式，通过服务业的转型和发展，再造“中国奇迹”。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应积极重视和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和支持重点产业的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确保中国在下一轮技术革命中处于引领地位。

表 4-1：多方案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预测表

方案	产业分类	2015	2020	2025	2035	2050
基准方案	第一产业	8.83	7.52	6.89	5.42	3.48
	第二产业	40.93	37.47	34.10	28.10	24.22
	第三产业	50.24	55.01	59.01	66.48	72.30
高方案	第一产业	8.83	7.30	6.61	5.16	3.16
	第二产业	40.93	38.23	33.88	31.52	29.89
	第三产业	50.24	54.47	59.51	63.31	66.94
低方案	第一产业	8.83	7.75	6.99	5.58	3.83
	第二产业	40.93	36.69	32.79	25.94	18.81
	第三产业	50.24	55.56	60.22	68.47	77.36

4.2 中长期中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 2050 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发展，具体在经济方面就是三大产业的发展。因此，准确把握和引导中国三大产业及其结构的发展方向，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4.2.1 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成为普遍的农业发展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开始受到全球性的关注，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两大问题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由于当前农业的高投入、高消耗以及由此带来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等相继兴起。从农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从传统农业再到现代农业及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是由中国人口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短缺等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农业属于资源限制型农业，水土资源紧缺且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据统计，中国水资源总量为 2.8 万亿 m^3 ，居世界第 6 位，但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 1/4，在世界排名第 121 位。因此，必须走一条既能充分利用资源，又能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农业转型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世界农业劳动人员的数量和年龄结构来看，农业相关从业人员的数量成下降趋势，而从业人员的年龄成上升趋势。以美国为例，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平均年龄已经达到 65 岁左右，仅占全美人口不到 2% 的美国农民，不仅养活了近 3 亿美国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因此，无论是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当今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还是从中国资

源短缺的基本国情来看，发展大规模经营、大机械生产的现代农业和能源资源集约型、人力资源集约型的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4.2.2 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制造业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然而，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先进制造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仍大而不强，在产业结构、资源利用率、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仍然不足。在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中明确提出了“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和到 2050 年“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目标。因此，积极鼓励和支持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制造业发展成为中国第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从当前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来看，2016 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 39.8%，但同时，中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西方国家。技术因素和绿色因素成为制约当前中国工业发展及其产品竞争力的两大障碍。因此，积极发挥绿色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优化升级中国传统工业制造业，实现工业制造业的现代化和生态化发展，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按照《中国制造 2025》的要求，到 2050 年中国将实现制造业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提质增效的发展道路和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形成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和绿色制造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当前能否及时有效地改造传统工业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制造业升级，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4.2.3 消费型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第三产业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从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已超过 50%，2016 年底达到 51.6%，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2012 年，低、中、高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 49.5%、54.8%、78.5%”，中国还处于低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从服务业的发展质量来看，中国的服务业还处在比较低端水平，同时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布不均的状况。从当

今世界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来看，2010 年世界进入服务经济时代，2013 年全球大约 70 多个国家进入或超越了服务经济时代。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处于从服务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期，如荷兰和德国等；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如美国和丹麦等。可以说，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将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但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对外贸易来看，当前中国服务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其中专有权利使用、咨询服务等发展仍然不足，服务业对外贸易种类过于单一。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就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转变消费方式，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水平发展，加快生活方式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做到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当前，我们应以高效的经济和社会服务为基础，以流通服务为支撑，全面提升知识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积极发挥服务业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3 中长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特别是工业生产能力和迅速提高，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 20%，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产业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制造业大都从事以加工组装和贴牌生产为主的低端环节，产出效率不高。从制造技术水平看，中国重要行业核心部件和高端精密设备严重依赖进口，如，中国高端芯片 80% 依靠进口；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客机 C919 的全部发动机均靠进口。从质量品牌看，中国工业制成品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三低”产品居多，中高端产品和自主品牌少。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十三五”规划强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对产业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都为加快推进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指明了方向。

4.3.1 农业发展走向全球的战略态势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动荡中前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系统筹划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适时推出影响未来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发展前景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一切为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提供了新的战略背景。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一是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已经具备在全球范围内筹划农业发展的国家实力。改革开放 30 年，是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高的 30 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德国等众多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处于世界前列，2018 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30727 亿美元，连续 13 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熨平世界经济波动的重要稳定器。当前，借国家实力东风，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正当其时。二是虽然 ABCD 四大国际粮商在全球农产品市场占居重要地位，暂时掌控全球主要农产品定价权，但是全球未开发农业资源仍然充沛，当前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仍然拥有巨大发展空间。非洲、东南亚、拉美、俄罗斯仍然拥有大量待开发耕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世界农业产业链条还有许多区域空白和环节缺口。当前，利用世界农业发展潜力空间，填补区域空白，衔接产业链条缺口，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正逢其时。三是中国农业企业成长迅速、农业技术发展成熟，造就了中国农业走向全球的深厚内功。跨国企业是农业走向全球的主体，先进农业技术是农业走向全球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迅猛，涌现了一批竞争力雄厚、国内外市场开拓能力强大的外向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境外农业投资、跨国农业经营等方面初露锋芒，业绩喜人。农业技术方面，中国拥有众多技术优势，如杂交水稻、病虫害防治、畜禽饲养、节水灌溉、沼气建设等技术傲居世界前列，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动力，还通过技术示范中心为众多亚非拉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援助。当前，以外向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雄师，以先进适用农业技术为利器，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正逢其时。

“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农业发展走向全球的战略选择将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布局全球农业产业链，打造一批重点跨国农业企业，深度融合和掌控全球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重大增值节点，坚持“和合”发展理念，促进中国和东道国农业的合作共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持续、

稳定、安全、有效供给，构建高效、持续的全球农产品供需统筹网络和农业科技与资源的全球配置网络。

4.3.2 制造业跻身全球中高端价值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有效承接了国际产能向中国的转移，充分学习先进技术，借鉴先进经验，逐渐发展形成了产业门类全、技术水平高的工业体系，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利用外资国。制造业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分化，分产业来看，高铁、核电、航天装备、电信和船舶等行业已经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水平。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以核电技术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装备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都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热点和亮点。电子商务行业正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打破沃尔玛等采购商的垄断，逐步成为该领域全球价值链的新主导者，在全球价值链中占居高水平。纺织品、皮革与鞋类和基本金属制造业处于中高端水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进口国外原料和中间品较多，主要是出口纺织服装的最终产品。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目前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制造业将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以科技资源密集的城市为核心，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平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激发各方创新积极性，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同时，依托广交会、义乌商品交易会等国际性展会品牌，以及淘宝、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商品供应链分工格局，实现从销售“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换。二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精细制造和绿色制造，加快掌握核心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赶超机遇，加快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要按照精益求精的要求，积极发展精细制造，提高中国制造业生产的精细度。要围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

绿色制造体系，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面发展，大幅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三是推进制造业“质量革命”和品牌建设，实现从产品制造向精品制造转变。要围绕提高品质，强化质量标准管理，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更好发挥标准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的引领作用。要瞄准增加品种优化产品供给，挖掘需求盲点，开发个性化、时尚化、功能化产品，丰富产品类型和档次，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定制化需求。要紧扣创建品牌培育知名产品和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培育一批有特色、有价值、有底蕴的“中国品牌”和“金字招牌”，以品牌建设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4.3.3 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工业来说，仍然比较滞后，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为生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一国经济实力地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部分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其经济格局的主导，成为其在国际分工中抢占先机的关键。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由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受到发达国家企业的遏制，在中国处在经济增长快进发展时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对偏慢，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需求仍不能相适应。

近年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涌现出了一些新兴业态和新增长点，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对未来一段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行总体部署，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当今全球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知识密集度最高、高层次人才就业最集中的产业，是推动一国产业升级的强大引擎，也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制高点。

“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服务于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生产性服务业将迈上产业链的中高端。一是服务于制造业发展的行业，如研发、创意、设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贸易，特别是商贸、物流、建筑设计等服务业领域以及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业等领域。苹果一家公司攫取了全球手机市场利润的

90%。从国家层面将支持华为等国产手机及通讯厂商加大研发投入和原始创新。

二是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行业，如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业、物流、保险行业等。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来重塑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将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的动力，牵引和支撑中国制造迈向强国。

第5章 中国人口及社会发展趋势预测

5.1 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趋势预测

5.1.1 各主要研究机构对中国人口总量及结构的预测

(1) 人口总量预测

总结国内外机构对中国人口总量的预测，可以发现，越是新近做出的预测，人口总量峰值越低，而且人口峰值到来的时间越靠前；此外，越是官方机构的预测越高，越是研究机构的预测越低。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预测显示，2020年人口总量为14.54亿人，峰值在2034年为14.86亿人，2050年回落至14.4亿人。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25亿人，峰值在2029年为14.42亿人，2050年回落至13.83亿人。2010年国家能源办《国家能源战略研究》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4亿人，峰值在2025年约为14.2亿人，2050年降至13.5亿人。2013年6月，联合国人口司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33亿人，峰值在2030年为14.53亿人，2050年降至13.85亿人。2014年11月，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08亿人，2028年达到峰值为14.29亿人，2050年下降至13.51亿人。2016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中国人口态势与中长期发展趋势》中指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或将使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延后3年左右，于2028年前后出现，达到14.5亿人。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指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有所增多，“十四五”以后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上升影响，人口增长势能减弱。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2017年3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我们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

(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老年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2013年，中国老年人已达2.02亿，占总人口的14.9%。根据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预计，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3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6.1%，2050年上升至4.3亿人，占比达到30%。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指出，劳动年龄人口波动将下降，劳动力老化程度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在“十三五”后期出现短暂小幅回升后，2021—2030年间将以较快速度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到2030年，45—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左右。而中国科学院、全国老龄委、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等机构也对中国未来的老年人口结构做出了相应的预测。

表 5-1：各主要研究机构对中国老年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机构	2013年		2020年		2050年	
	60岁及以上人口 (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 (%)	60岁及以上人口 (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 (%)	60岁及以上人口 (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 (%)
人口计生委	2.0243	14.9	2.34	16.1	4.3	30.0
中国科学院			2.28	15.9	4.06	27.9
全国老龄委			2.48	17.2	4.37	31.0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2.58*	17.9*	4.87*	34.9*
北京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			2.31	15.6	4.12	27.4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			2.40	17.0	超过4	30.5

注：*为2021年数据；*为2053年数据。

资料来源：《走向2020：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挑战和对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

5.1.2 中长期中国人口总量预测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受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放慢趋势，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近两年放开“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的计生政策，以及考虑到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未来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会小幅反弹，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4.16亿人，将在2030年前后出现人口总量峰值，峰值约为14.5亿人左右，2050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13.95亿人。

表 5-2：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及年均增长速度预测表

年度	人口总量（亿人）	时期	人口增速(%)
2015	137462	—	—
2020	141565	2016-2020	5.9
2025	142635	2021-2025	1.5
2035	144391	2021-2035	1.3
2050	139500	2036-2050	-2.3

5.1.3 中长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总体来看，今后中国老龄化形势将进一步加剧。根据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考虑到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预测到 205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快速老龄化阶段、加速老龄化阶段和缓速老龄化阶段。

（1）快速老龄化阶段（2016-2020）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同时中国人口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在此阶段，中国老年人口迎来第一个增长高峰，将达到 1.86 亿人，占比达到 13.2%。这一阶段增加的老年人口属于“50 后”，他们的思想观念、收入水平、生活方式不同于“30 后”、“40 后”，不仅消费能力强，而且只有少部分人赶上计划生育，大多数有 3 个及以上子女。这些子女是“50 后”老年人经济来源的主要补充，但这些子女目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太可能为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服务。不过，他们是发展老龄金融的重要客户群体，这一阶段是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黄金战略准备期。

（2）加速老龄化阶段（2021-2035）

从 2021 年开始到 2035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也是 21 世纪老年人口增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由 1.86 亿增长到 3.09 亿人，开始过渡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标志着中国从主要抚养儿童的时代迈入主要抚养老人的时代。这一阶段的老年人口主要是“60 后”。这批人经历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锐减，城市老年夫妇平均不到 1 个子女，农村老年夫妇平均也只有 2 个子女左右。这批人思想观念开放、生活方式现代化、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

（3）缓速老龄化阶段（2036-2050）

从 2036 年到 2050 年为缓速发展阶段，中国人口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此阶段，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长态势放缓，

由 3.09 亿人增长到 3.89 亿人，占比达到 27.9%，也就是说中国每 3 个人中就有 1 名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一阶段增加的老年人口大多是“70 后”，他们中很多人拥有巨大的老龄金融资产，将是老龄产业的直接消费者和间接消费者。在此阶段，中国老龄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

表 5-3：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

年度	人口	年龄结构总量（万人）			年龄结构占比（%）		
	万人	0-14 岁	15-64 岁	65 岁以上	0-14 岁	15-64 岁	65 岁以上
2015	137462	22715	100361	14386	16.5	73.0	10.5
2020	141565	22933	99992	18639	16.2	70.6	13.2
2025	142635	22679	97277	22679	15.9	68.2	15.9
2035	144391	22092	91399	30900	15.3	63.3	21.4
2050	139500	20367	80213	38921	14.6	57.5	27.9

5.2 城镇化发展趋势预测

5.2.1 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镇化转型的核心就是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中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城乡区域差异大，农民市民化程度低、成本高，面临的障碍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推动城镇化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城乡分割型向融合共享型转变、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

一是走渐进式城镇化之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镇公共设施容量、人口吸纳能力和政府财力等，科学确定城镇化的规模，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和节奏，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采取渐进式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各地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保持适度，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工业化阶段和产业支撑能力相适应，与城镇人口和就业吸纳能力相适应，与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容量相适应，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防止出现超越承载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城镇化“大冒进”。

二是走集约型城镇化之路。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大力推广城市节能、节材、节水、节地技术，提倡节能节地型建筑，培育节约型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立高效集约节约利用资源的长效机制，走紧凑节地、高效节约的集约型城镇化道路，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提高城镇资源配置效率。要科学

确定各类城镇建设密度，研究制定各项集约指标和建设标准，强调紧凑、集中、高效的城镇建设模式，充分挖掘城镇土地潜力，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促使城镇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形成紧凑、高效的城镇用地格局，建设紧凑型城镇、紧凑型社区、紧凑型园区、紧凑型村庄，防止城市过度蔓延和无序发展。

三是走多样化城镇化之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综合考虑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推动形成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等级有序的城镇化规模格局。积极引导城市群有序发展，着力提升其国际竞争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之成为引领全国发展的主导地区和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促进大城市产业转型和功能提升，调整优化空间结构，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使之成为吸收新增城镇人口的主渠道；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扩大就业机会，使之成为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四是走可持续城镇化之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充分利用自然山体、河流、湖泊、森林、农田等，构建开放的城镇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积极推广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技术，加快构筑绿色生产和消费体系，推进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和“阳光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镇化格局，促进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走绿色、低碳、环保、宜居的可持续城镇化之路。科学确定开发强度，划定生态红线，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建设可持续宜居的美丽城镇，创造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良好人居环境。

五是走智慧型城镇化之路。坚持城市建设与智慧系统建设相结合的基本理念，综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积极推动城镇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建设，完善智慧型产业体系和交通体系，强化城市智慧管理，依靠智能技术和智慧管理破解“城市病”，智慧地推进城镇化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充分发挥社会和民间资本作用，防止各地盲目跟风、各自为战、贪大求全，大搞形象工程。

六是走和谐型城镇化之路。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加强城市危旧房、城中村、棚户区 and 边缘区改造，进一步完善城镇安全和社会保障体系，高度关注城市各类弱势群体，制定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和反贫困政策，积极推进和谐拆迁，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

有效破解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难题，逐步消除城乡和城市内部双重二元结构，真正把和谐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城镇化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切实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构建一个以平等、公正、共享为特征，不同群体和睦共处、相互包容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5.2.2 中长期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预测

一般而言，城镇化率 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其中，城镇化率 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界，30%-50%的区间为加速时期；50%-70%的区间为减速时期。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越过 50%的拐点，2016 年达到 57.35%，今后城镇化的速度将逐步放慢，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然而，由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未来各地区城镇化趋势将呈现不同的格局。总体上看，东部和东北地区已进入城镇化减速时期，其城镇化速度将逐步放慢；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是中国加快城镇化的主战场。随着中西部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城镇化率差异将逐步缩小。

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可能像某些城市型小国那样达到 100%的城镇化率。即使未来中国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到 10%以下，仍有相当一部分非农业人口因工作需要或对农村的向往而愿意居住在农村。到 205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接近这一“天花板”，届时中国的城乡人口结构和空间结构将基本上趋于稳定。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城镇化，到 202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这种情境下，采用经验曲线法、经济模型法和联合国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对中国城镇化趋势进行预测，综合考虑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4%左右，根据城市型社会的阶段划分标准，届时中国将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到 2025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4.6%左右，2035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68.5%，之后中国将进入城镇化缓慢推进的后期阶段；205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75%左右，总体完成城镇化的任务。

表 5-4：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预测表

年度	人口	城镇		乡村	
	万人	人口数（万人）	比重（%）	人口数（万人）	比重（%）
2015	137462	77116	56.1	60346	43.9
2020	141565	85575	60.4	55989	39.6
2025	142635	92142	64.6	50493	35.4
2035	144391	98908	68.5	45483	31.5
2050	139500	104625	75.0	34875	25.0

第6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2020—205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应在各方面建设取得扎实进展的基础上，明确新时期发展路径，构建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框架，做好新时期发展的政策储备，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公平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6.1 基本路径

实现后小康社会目标的路径概括起来有三方面，一是消除发展隐患，尽最大可能规避发展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填平发展鸿沟，为发展寻找可持续的动力。三是突破发展瓶颈，使发展的动力有充足的施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1) 消除发展隐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风险高发期将形成交汇，一方面，经过前期发展，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但另一方面，长期积累的风险也将进一步凸显，各种风险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经济发展制约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识别风险、化解风险从而消除发展隐患将是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金融风险。从国际上看，存在国家财富缩水风险和国际资本流向逆转风险。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中长期不会改变，美元贬值的趋势短期不会改变，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任务艰巨。中国一直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最大目的地。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时刻防范国际资本流向突然逆转风险。从国内看，金融风险将集中在四大领域：一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信贷刺激后形成的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数量不清，虽然整体风险可控，但是存在流动性风险。二是与房地产、城投债有关的投融资信用风险。房地产行业与金融存在天然联系，房地产市场波动，特别是房价回落将会明显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加速金融风险传导，使金融风险复杂化。三是影子银行风险。影子银行体系日益活跃，发展速度过快与监管滞后并存，传统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通过影子银行转嫁到普通金融服务购买者身上。四是产能过剩引发的信用违约风险。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已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灾区，钢铁、光伏、船舶等产能过剩行业成为不良贷款增长的高发行业。

财政风险。其一、财政收入下降风险。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综合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房地产市场拐点的到来，土地市场冷却，房地产投资减速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将会对地方财政带来双重压力，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先行地方税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税收渠道狭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都将加剧财政风险。其二、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加大。当前，已有近 20 个省市偿债率高于 20% 的国际警戒线。财政收入增速递减、民生刚性支出的双重压力将加大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使得财政支出可持续性受到制约，如果财政增收乏力现象进一步加剧，或将波及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等民生支出。一旦出现债务偿付危机，地方政府在短期内必须拿巨额财政资金支付债务。

房地产风险。一是楼市区域分化加剧。房地产市场调整可能成为首先暴露的风险点。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继续累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自住与投资需求不足，出现了严重过剩局面，部分城市价格出现连续下跌。二是房地产风险的扩散效应。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波及传导效应会使相关行业的经营风险上升并形成共振反应，也会带来负财富效应，冲击企业与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经济会受到较大冲击，银行信贷质量问题也将暴露。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风险将迅速演变成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将造成严重伤害。三种风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化解这三类风险，重在统筹协调，分类处理。一是缓释流动性过剩和错配风险。加快金融结构性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二是化解信用和信贷风险。盘活沉淀在过剩产能上的信贷资产，减少风险总量。三是疏导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违约风险。金融监管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核查，指导金融机构做好各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管理，防止资金链断裂引发风险传染。四是关注房地产拐点风险。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预期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对房地产拐点风险的排查，做好风险防控预案，防止“一刀切”式的停贷、抽贷、压贷造成资金链断裂。五是监控影子银行风险。统一影子银行业务或产品的监管要求，加强流动性、杠杆率、期限错配、交易风险等方面的监管。六是加大违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妥善处置金融风险苗头，避免风险扩散蔓延。

（2）填平发展鸿沟

克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必须消除发展动力的不平衡、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平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关系经济运行和人民切身利益的矛盾。

发展动力的不平衡。经济新常态下，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追赶态势进一步增强使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扩大消费的作用日益凸显。更重要的是，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从实现小康到形成真正的大众消费需求需要一个过渡阶段，扩大民间消费具有迫切性，发展动力不平衡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消除。实现发展动力的平衡，关键是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重点是完善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切实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消费；优化消费环境，便利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引导消费；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创造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提升消费。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平衡。经济增速快而民生改善慢、经济改革快而社会保障建设慢、硬件建设快而社会管理软实力没长进等问题都是经济社会与社会建设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也是后小康社会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难点所在。加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协调性、平衡性。处理两者的不平衡关键是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发展必须回应人民期待，必须让人民看得见、摸得着。没有民生改善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二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各项改革难免产生阶层阵痛，社会政策要起到托底的作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三是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四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政策的支持重心落到城乡社区，提升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地区间人均生产总值差距过大，各地区人民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尚未合理有效发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格局尚未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面看是经济差距大，本质上则是要素配置效率、要素创新能力的差距。缩小差距不能再靠投资驱动，更不能靠行政指令，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积极创新

的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在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利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形成竞争新优势，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协同发展。

（3）突破三大发展瓶颈

传统要素（劳动力、资本）的边际效应递减，新要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尚未形成，2020年以后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突破制约发展的要素瓶颈、体制瓶颈以及生态瓶颈。

要素瓶颈。一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压力越来越大。能源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长期处于“硬约束、紧运行”的状态。单独依靠本国能源资源已经不可能。利用国际能源资源的代价越来越高。资源能源采购市场复杂化，资源能源运输安全保障程度降低。二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时代面临终结。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土地、原材料要素供应日趋紧张。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从劳动力的供给看，既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的问题，更面临劳动力供给结构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以及人力资本发展难以适应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问题。突破要素瓶颈，关键是要实现要素升级。结合国情、地情，培养高端人力资源、技术引进创新等高级生产要素；打造有利于高级生产要素培育的良好外部环境；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创新步伐，通过创新实现生产要素的升级；加强人力资源培养和升级，不断强化人才的核心地位。

体制瓶颈。一是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政府和市场关系仍需进一步理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二是重点领域改革出现利益固化，现行机制体制不能满足探索性、攻坚式改革的要求。突破体制瓶颈，核心要义在于充分调动市场经济各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事务的干预，以利润为导向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以竞争为手段决定商品价格；以价格为杠杆调节供求关系。二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重视对改革的整体设计，制定全方位改革的具体规划。三是继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拓展产权保护制度的内涵。特别是加速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完善土地确权工作完成后的纠纷预

防、调节、处理机制。

生态瓶颈。“生态赤字”正在逐年扩大。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根据国际经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即使是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排放污染物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破解生态瓶颈，关键是坚持绿色发展。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资源的基本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6.2 战略框架

制度立国、创新强国、发展富民、合作安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制度立国是基础，从根本上保证发展不改旗不易帜。创新强国是关键，从根本上为深化改革提供源动力。发展富民是目标，从根本上诠释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和本质。合作安邦是助力，有利于中国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1) 制度立国

从严治党。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的领导，从严治党是题中之义。一是要增强战略定力，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样。二是落实领导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避免不作为，调动党员干部干事业的积极性。三是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

依法治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后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应注重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应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到依靠法治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文化、价值认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个把已经凝练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上倡导、宣传、教育、认同、修养、行动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目的是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增加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牢牢掌握后小

康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2) 创新强国

优化创新环境。一是凝聚创新力量，使不同利益追求、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创新主体和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容忍失败的氛围，鼓励企业个人不断探索和创新。二是完善职业教育体制，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包括职业教育学历、职称等），形成尊重人才、用好人才的制度保障。三是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由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机制，构建一套灵敏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

完善创新政策。政府要有一整套在税收、信贷、奖励等方面的措施，帮助创新者和创业者实现梦想。要有一整套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尊重创新者和创业者的首创精神。要有一整套激励从事创新的产权分享制度，让创新者和创业者的劳动具有价值。要建立技术工人职称评定制度，使高级技工享有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同等待遇，改变“重学历、轻技能”的人才选用导向。

(3) 发展富民

切实重视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让农民拥有财产性收益。实现途径是加速产权改革：一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明确界定农民土地产权，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流转选择权、收益获得权和法定处置权。二是加快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流转机制。合理规划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城市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收益，实行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探索土地跨地区有偿调剂机制。

建立高效、面广、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使之逐步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二是建立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模式。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模式由涵盖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险、补充保险在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构成。三是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形成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

(4) 合作安邦

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秉承合作、竞争、共赢原则正确处理后小康时代的国际关系。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将大幅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将从“追随者”变为“引领者”。竞争替代大于反哺效应，产业竞争与产业转移并存。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处理两个维度的关系成为后小康时代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一是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关系。承认双方在核心

利益上的冲突，面对冲突，才能找到解决办法，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二是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关系。矛盾将随着双方实力差距的缩小而增加，化解矛盾、谋求共赢才能和睦相处。应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及时做好风险评估和反馈。做好重大区域对外合作战略的风险评估机制。“一带一路”的落地、风险评估。可以预见的是，到2030年，“一带一路”战略已经顺利铺开，从2030—2050年，“一带一路”走向纵深发展，其关键在于风险评估和反馈。一是资金风险，投入的资金是否能有足够的回报。二是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在投融资过程中面临信用违约风险。三是国家政治风险。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可控性差，一旦发生将影响战略的实施。因此，必须正确评估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不同影响，细化对一些地区未来局势的风险评估，处理好与多元力量的竞合关系，形成于我有利的战略态势。

6.3 主要政策

坚持发展自信、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重要经验。在后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应继续秉承自信、科学、绿色、开放、包容的理念，将各项政策深入推进，催生出最全面、最稳定、最持久的竞争优势。

(1) 坚持发展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维一体构成的，坚持发展自信，就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坚定道路自信。坚定道路自信，在宏观上做到三个必须和两个统筹。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立足国情才能谋划发展；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通过发展坚定信心。在具体工作中关键是实现两个统筹：一是经济建设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统筹；二是统筹改革开放和共同富裕。

坚定理论自信。关键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源动力”。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理论和话语体系。

坚定制度自信。核心着力点在于发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坚持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到2050年，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行政体制改革上迈出新步伐。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方向，进一步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信念和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将其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推动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在文化发展繁荣中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坚持科学发展

以推进产权界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方向是：产权界定。产权界定联系宏观微观，是释放经济活力的必要条件。土地确权、国有资本的配置、民营企业产权保护都是在 2050 年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以产业转型和升级进一步增强长期发展后劲。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完成制造业从 2.0 向 4.0 的跨越，为中长期发展增加后劲。

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在 2030 年前，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在 2050 年前，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3) 坚持绿色发展

制定科学的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资源开发利用和监管、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责权利关系。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制定生态环境补偿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的长效机制。

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污染的绿色新兴产业，逐步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为经济发展腾出更多的环境容量，走环境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制定环境法律政策。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和法律，减少污染，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有效的法律和经济政策，可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使“失灵”的市场充分运行起来，成功地解决外部性问题，有效治理环境污染。

（4）坚持改革开放

一是重点推进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四方面的改革。制定并实施深化金融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金融创新与监管、预算管理制度和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加快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加快。真正启动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

二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开放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通过开放培育区域发展新动力，加快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新格局；通过开放培育经济发展新环境，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享受法律保护；在开放创新中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引领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增强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三是做好经济、社会改革的政策评估。对内，逐项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务，并且做到每项任务有评估、有反馈，真正评估改革的落实情况。对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机制。“一带一路”、“亚投行”工作进展评估机制。

（5）坚持包容发展

调整利益平衡机制。关键是建立以下五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公共责任机制，有效运行的利益调节机制，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快捷的利益矛盾化解机制，执行到位的利益补偿机制。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初次分配应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早日形成生产要素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在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上强化政府责任。

调整社会管理模式。一是坚持系统治理。治理的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变。推动社会管理模式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着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和助手作用。二是坚持依法治理。治理的方式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切实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努力把各项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三是坚持综合治理。治理的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

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